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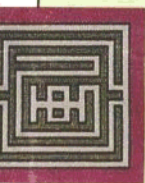


甘肃出版史略

白玉岱 著



甘肃人民出版社



甘肃出版史略
PDG

前 言

图书是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工具，也是人类物质文化生活借以发展的重要手段。每个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图书生产，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该地区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水平，并为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同其它任何事物一样，图书出版事业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不仅内容随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而且成书队伍、生产方式、书籍制度等，也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图书出版事业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图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方式及书籍制度，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对继承和发扬我国图书出版事业的优良传统，做好当代的图书出版工作则是十分有益的。

甘肃是华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最早发明文字、生产图书的地区之一。举世闻名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等，便是甘肃早期文化的例证；而秦汉简牍、敦煌遗书等，则又是自汉至五代时，甘肃图书事业兴旺发达的物证。自宋代始，由于海上交通的发展，甘肃的图书事业随着丝绸之路的萧条而失去昔日的繁华景象，但甘肃人民仍在努力地创造和发展着自己的图书出版事业。直至当代，甘肃图书在祖国图书出版事业中仍占据自己应有的地位。一部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装帧别致而精美的图书，成为我国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肃的图书出版历史悠久，史料丰富，但自古至今，却没有人对这一历史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尤其是对甘肃图书的生产机构、

生产程序和书籍制度等，往往被历代研究者所忽视。因此，各个时期的图书生产情况，正史基本没有记载。

1986年，我因工作需要，参加了《甘肃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卷的编写工作。近八年的资料搜集和编写工作，使我积累了数百万字的有关中国及甘肃历代图书出版史料，于是我便产生了编写甘肃图书出版史的念头。面对数百万字的史料，我重点研究了甘肃出土的秦汉简牍的形式及抄写方式，国内外收藏敦煌遗书的装帧形式、抄写规则、雕印质量和题记内容，并对明清时期的部分藏书逐一查考其开本大小、印装质量和版权记载等，对近现代和当代图书归类整理，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分为著作与图书、书籍形式与装帧、书籍的生产方式及机构、图书的发行和民国以前甘肃藏文图书的出版与发行五章，最后一章为近年来撰写的研究甘肃图书出版史的文章和明清时期甘肃印刷图书目录，定名为《甘肃出版史略》，奉献给读者。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引用了《甘肃省志新闻出版志·出版》卷中张文涛、孙德仁、马国华等先生所撰写部分的有关史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我也十分感谢周丕显教授、薛英群教授及甘肃省图书馆文献部的领导和同志们，对我在研究甘肃图书出版史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本人学业和编写时间的限制，书中错误在所难免，望广大读者及同行批评指正。

作者

一九九五年三月

目 录

第一章 著作与图书	(1)
一、先秦时期有关著作的传说和记载	(1)
二、两汉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3)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8)
四、隋唐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15)
五、宋元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24)
六、明清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28)
七、民国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38)
(一) 刊物	(39)
(二) 图书	(43)
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出版	(49)
(一) 出版概况	(49)
(二) 几大类图书的出版	(60)
附：甘肃人民出版社 1950—1990 年出书统计表	(110)
甘肃省图书出版种数及总印数年际变化表 (1950—1990)	(112)
甘肃省政治社科、文化教育、文学艺术、科学技术 四大类图书出版种数年际变化表 (1950—1990)	(113)
1990 年甘肃省公开发行期刊名录 (社科类)	(114)
1990 年甘肃省公开发行期刊名录 (自然科技类)	(116)

第二章 书籍形式与装帧	(119)
一、简册形式.....	(120)
二、卷轴形式.....	(124)
三、经折装.....	(128)
四、册叶装.....	(130)
第三章 书籍的生产方式及机构	(143)
一、简册时期.....	(143)
二、写本书时期.....	(146)
三、雕版印刷时期.....	(151)
四、现代印刷术时期.....	(163)
(一) 清末及民国时期.....	(163)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69)
第四章 图书的发行	(181)
一、明清以前的图书发行.....	(182)
二、民国时期的图书发行.....	(189)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图书发行.....	(198)
第五章 民国以前甘肃藏文图书的出版与发行	(205)
一、藏文著作与图书概述.....	(207)
二、藏文图书的生产及其发展变化.....	(217)
三、藏文图书的发行.....	(229)
第六章 图书史研究	(231)
一、敦煌遗书与我国古代的成书业.....	(231)
二、敦煌遗书与我国古代的雕版印刷.....	(240)
三、敦煌遗书与蝴蝶装.....	(245)
四、左宗棠与西北的图书出版事业.....	(250)
五、明清时期甘肃印刷图书目录.....	(259)

第一章 著作与图书

图书是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物质文化生活借以不断进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一般地说,有了文字,就有了传播知识的媒介。人们用它来记录生产、生活中的思想、行动、经验和教训等,于是就给别人和后世留下了“档案”。当人们开始自觉地使用文字来陈述自己的实践,阐明自己的思想,并且把它写在一定形式的材料上,以便传向远方、流传后世,用作传播知识和启迪别人时,便产生了著作和图书。

著作和图书的概念及区别在当今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图书是经正式出版的著作,而著作不一定是图书。但越向古代,著作和图书的概念就越趋一致,其区别越来越小。如写在简册上的文字,如果只供作者自己保存,则可被识为是著作,如果由官方批准,或由学校、社会团体传抄,用于教学或在社会流传,供别人阅读,则可识为是图书。写本书时期,著作和图书的概念及区别也是如此。但自雕版印刷被广泛应用以后,著作同图书的概念、区别及其之间的联系就十分清楚了。

一、先秦时期有关著作的传说和记载

甘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最早使用

文字、生产著作和图书的地区之一。世传，早在伏羲时期，甘肃就有了文字的最初形式和著作。

伏羲，古成纪（今天水一带）人，是古代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他经常留意观察、分析研究各种自然现象，以“—”代表阳，以“- -”代表阴，并且用三个阴阳符号组成一组，象征某种自然现象，共组成八组，分别象征天、雷、泽、火、风、水、山、地八种自然现象，即所谓的八卦。伏羲创造了八卦后，一边教民众画读认识，一边讲述这八种自然现象的性质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帮助人们了解自然灾害发生的原因和避开自然灾害的办法。所以西汉孔安国在《尚书序》中说：“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始文籍生焉。”就是说，是伏羲创造了文字，他的八卦就是最初的文字和著作，甚至可认为是书籍的雏形。

民间传说，伏羲当时创造八卦、演绎卦意的具体地点，就在今天水城北三阳川附近濒临渭河的一座山上。后人称其为“卦台山”，是古秦州八景之一。很早以前，卦台山有一座很大的伏羲庙，庙内有伏羲塑像，还挂有一个圆盘，盘上刻着八卦，据说这是当年伏羲赠给大禹的玉质八卦圆盘。而今庙已拆毁，玉卦也无有踪影。但五百多年前存放在卦台山伏羲庙中的明代木制八卦盘，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幸从一农民家中找回。卦盘直径三尺，厚三寸，紫红色，上面除刻有八卦外，还刻有日、月、星、辰天体图，二十八星宿图，二十四节气和六十四卦方位等，造型美观，雕刻精细，虽已断裂为两半，亦总算是一个幸存的古老八卦，也算是复制的伏羲古书。

另据记载，伏羲还有三部著作流传后世，即《周易》《连山易》和《乾坤凿度》2卷。《史记》称《易》为伏羲所作，经文王、周公、孔子之传而大备，其书家弦户诵。《连山易》因连山卦以纯艮开始，艮象征山，故名。宋·朱元昇曰：“连山作于伏羲用于夏”。《乾坤凿度》2卷，宋·郑樵《通志》载：“是书为伏羲文，黄

帝演，仓颉修注。”

甘肃传说中的著作者还有岐伯等人。岐伯，北地（今宁县）人。传说中的古代医学家，是黄帝的近臣和医生。其名见于《内经》。岐伯的主要著作有《黄帝内经》《黄帝岐伯针论》2卷、《黄帝岐伯论针灸》2卷、《灸经》《岐伯针灸要诀》《岐伯经》10卷、《岐伯按摩》10卷等。

据考古发现，远在5000年前左右，生活在甘肃东部泾河、渭河、西汉水流域和中部黄河、大夏河、庄浪河与青海东部湟水、大通河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区的人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甘肃“仰韶文化”、齐家文化、火烧沟类型文化、辛甸文化、寺洼文化、沙井文化等。居住在甘肃部分地区的人们，使用石器、陶器、铜器，制造铲、刀、镰、壶、瓮、罐、瓶、钵，发展农业，谋求生活，同中原人民共同缔造和发展了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原始文化。出土的这一时期的彩陶，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堪称甘肃彩陶艺术的瑰宝。1967年在灵台县白草坡西周墓中发掘了数十件青铜器，从其铭刻中也可见当时甘肃文字之一斑。在出土的34件酒食器中，有铭文的铜器24件，合计铭文14种，如“夆作尊”、“匀”、“子姒作母辛尊鼎彝子夆”、“漂伯作宝尊彝”、“陟伯作宝尊”、“伯作彝”、“龟父丁”、“莘父辛”等。其意有王名、臣名、地名等。

二、两汉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两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开辟横贯甘肃的中西交往通道——“丝绸之路”之后，加强了对甘肃的开发和甘肃同祖国各地的联系。于是，甘肃的图书

事业也呈现繁荣景象。一些有名的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和诗人，教授生徒，著书立说。一批儒家经典、个人文集，以及文学、科技、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图书相继问世，有些图书在当时就居社会重要地位，至今仍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1. **儒家经典**：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后，甘肃各地设置学官，一些儒雅之士收集整理了大批的《诗》《书》《礼》《论语》《春秋》等儒家经典作为教本，以供生徒习诵。武威等地出土的汉简中，《仪礼》《论语》《晏子春秋》《公孙龙子》大都是当时学官的教本，而《急就篇》《仓颉篇》则是当时小学生的识字用书。

《仪礼》¹于1959年在武威汉墓中发现，共9篇469简27332字，分甲、乙、丙三本。甲包括《士相见之礼》《服传》《特牲》《少牢》《有司》《燕礼》《泰射》，乙本有《服传》，丙本有《丧服》。这是我国现存的唯一的一部简册形式的儒家经典，原本为已经失传的庆氏（庆普）本，成书于西汉晚期。

2. **文学**：西汉陇西李陵首开甘肃将军谈诗之先河，著《李少卿诗文集》2卷。到了东汉，甘肃的诗、赋、颂已有相当水平。陇西秦嘉、徐淑的《夫妻赠答诗》，写得婉转流畅，自然和谐，受到历代诗论家和诗选家的称赞。唐人欧阳询等编纂的类书《艺文类聚》，将它作为《闺情》书信的典范加以收录；梁代钟嵘在他的《诗品》中说：“夫妻事既可伤，又亦凄怨”，将他俩的诗列入中品；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秦嘉夫妇往还曲折，具载诗中。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他托兴可以比肩”；清人沈德潜在《古诗源》中也曾评论秦嘉赠徐淑的诗是“词气和易，感人自深”。

另外，还有安定乌氏（今泾川县东）梁竦的《悼骚赋》，下辨（今成县西）仇靖的《西峡道颂》和敦煌广至盖勋的《琴诗》等，当时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

3. **个人文集**：甘肃的个人文集产生于东汉。安定临泾（今镇

原县)王符,终身不仕,隐居著述,写下《潜夫论》10卷。该书讥评时政得失,揭露豪强地主的贪婪和残暴,指出农、桑为“富国之本”,肯定“气”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它还以肥沃土地“费耕不获”,千里之马“费策不致”为例,强调人为的重要,反对圣人“生知”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该书是今人研究东汉社会的重要著作。

赵壹(今天水人),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愤世嫉俗的辞赋家,著有《穷鸟赋》《刺世疾邪赋》《迅风赋》《解楫赋》《报皇甫规书》《报羊陟书》《非草书》等赋、箴、诗、书、论及杂文16篇,总为《赵壹集》2卷。其代表作《穷鸟赋》和《刺世疾邪赋》,在后晋刘昫等撰写的《旧唐书·经籍志》和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撰写的《新唐书·艺文志》中都有记载。

另外,安定朝那(今灵台)皇甫规,托疾免归,著述立说,写下了《司农卿集》5卷;敦煌渊泉张奂,少游三辅,跟太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后罢官归里,写下了《太常集》2卷;被称为“草圣”的东汉书法家、敦煌人张芝,记其书法,写其心得,集成《张芝文集》;还有武威姑臧段熲的《太尉集》,敦煌侯瑾的《侯瑾文集》等,也都是当时较为有名的文集。

4. 科技文化:西汉后期,甘肃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文化人重视对应用科学的研究和总结,注意科技、文化用书的编写和传抄,一批农书、医书、历书、术数书等开始在民间使用。敦煌隐士氾胜,因天下兵乱去官还家,著述立说,写下了《农书》18篇,成为甘肃较早的一本农书,《汉书·艺文志》有著录,《太平御览》中有辑录本。

武威出土的《武威汉代医简》,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古老、最完整的医学典籍;共92简。内容包括临床施治、针灸学、药理学

等，记载各种方剂 30 多个，药物 100 多种，其中植物药 63 种、动物药 12 种、矿物药 16 种、其它药 9 种，并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炮制、剂型、使用方法等。其中有 20 多种药为《神农本草》书中所不见。它对校订《黄帝内经》《神农本草》《难经》等古代医药文献，具有珍贵的参考价值。

历算在汉代有很大发展。当时，甘肃也有历算家参加国家的制历工作。各种历书、日书在甘肃普遍使用。据《汉书》载，元封七年（公元前 104），武帝“以造汉太初历，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侯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酒泉侯宜君，就是当时甘肃的一位历算家。甘肃出土汉简中，有一批历书、日书和记载天文星象的书，居延汉简中有一记日食的残简，载“狗食日……戊申”；有一记星位禁忌的简，载“大时_{小时}并在东方_{北方西方}”等。在地理方面，有长安至河西驿置里程简，横排四行，列京兆、右扶风、北地、安定、武威、张掖郡等二十个地名和里程，是一份关于西北地理、交通的重要资料。

居延汉简中，还有《算术书》和《九九术》等。出土的九九表，从一一如一，到九九八十一，共四十五句。

九九八十一	四九卅六	八八六十四
八九七十二	三九二十七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二九十八	六八卅八
六九五十四	四八卅二	
五九卅五	三八廿四	(75.19)
九九八十一	八九七十二	七九六十三
六九五十四		(36.5)

5. 政治经济：政治方面，有律令、养老制度、抚恤制度、西汉刺史治所、冬狱、西汉秩奉等书籍。《王杖诏令》，是关于年高授王杖的诏令。该书当时在甘肃社会传抄，用于识字和普及法律

知识。内容主要包括尊敬长老、抚恤鳏寡诏令，抚恤孤独、废疾诏令，年高赐王杖诏令，处决乡吏殴辱王杖主的诏书，年七十杖王杖诏令等。

居延出土的《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是西汉宣帝时追查武帝之子广陵王刘胥集团阴谋篡权活动的御史书；《建武三年居延都尉吏奉册》是大将军府颁发的官吏奉禄例文书。另外，还有禁止砍伐树木的诏令，有朝廷关于购赏匈奴、反羌，来增爵除罪的诏令；有关于禁止斗殴、伤人和盗贼逃亡的司法文书；有关于职官婚嫁丧葬时衣着服饰应合礼制的汉律条例；还有《永始三年诏书》等。

1971年出土的甘谷汉简中，有东汉桓帝延熹年间（公元158—167）宗正府卿刘桓为宗室之事所上皇帝的奏书，并以“宣令天下齐同其制”的诏书律令颁行社会。

居延汉简《侯粟君所责寇恩事》，是一部完整的民事诉讼案例。记述了客民寇恩因甲渠侯粟君无理扣压了他的车器，企图赖掉他为粟君买米、买肉所花钱款，告发了粟君。粟君致书居延县庭，反诬寇恩卖掉借给他的牛而欠他钱。县庭将粟君的劾书转寇恩所在乡，专管诉讼的乡啬夫验治寇恩，写下口供，认定寇恩无罪。粟君不服，又上书居延都尉府。府令县重新验问寇恩。乡啬夫根据寇恩的申诉，认定寇恩不欠粟君的债，并将意见上报县庭，县庭将乡啬夫的报告及寇恩的第二次申诉，一并批转甲渠侯官，议决粟君为政不直。

经济方面，有农垦、屯田、农具、水利、耕耘、收藏、内销、外运、粮价、农作物、大小石换算等方面的书，还有记述汉代重要经济制度的“货算”和记述各级官署资产年报制度的“上计”等。

6. 军事：有烽燧守望、战斗防御、武器制造、射法等方面的书。陇西“飞将军”李广的《李广射评要录》《李广射法三篇》和

郁郅（今庆阳县）王围的《强弩将军王围射法》5卷，算是甘肃最早的军事著作。

居建出土的汉简中，《烽上品约》是居延都尉辖下的甲渠、三十井、殄北三塞临敌报警，燔举烽火，进守呼应的联防条例；《侯吏广德坐罪不循行部檄》是对戍吏广德玩忽职守，管理部燧不善，丧失防御能力的通报。还有军功爵律简等。

河西出土的汉简《相剑刀》，是王莽末年到东汉光武帝初，甲渠侯官长吏习读的一部书籍摘抄。这是当时的一册武器用书。书中列述了剑、刀及其花纹的优劣标准共18条之多，涉及剑刀的形状、大小尺寸、装饰、成份、制作演变及发展等问题。虽字数不多，但对研究我国古代兵器、冶炼技术以及整理古代军事学有极高的价值。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作和图书

魏以后，尤其是十六国时期，匈奴、鲜卑、羌、羯、氏轮番入据中原称王，中原地区政权迭变，生产和文化惨遭破坏。当时，河西虽受战争恐怖，但相比之下，还比较安定。先后建立于河西地区的五凉政权，治国理民，注意发展文化事业，使河西一隅的图书事业呈现兴旺景象。北凉政权任“博通经传、时人谓之宿读”的敦煌阉驷为秘书考课郎中，并组织三十多人“典校经籍，刊定诸子三千余卷”，使北凉的著作和图书有了较大规模的发展。五凉政权优礼士人，吸引了“中原章句之儒业”，象“善虫篆，训诂”、任晋冯翊太守的陈留济阳人江琼等，也弃官西投凉州，并子孙世居凉土，著书立说，对发展河西的图书事业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甘肃有记载的著述者90多人，著作达270

多部。其中个人文集 52 部，史志传记 49 部，科技著作 42 部，译经和宗教书 39 部，儒家经典及其注疏 30 部，政书 13 部，诸子 7 部，另外还有一批兵书和杂书。最有特色者为魏晋时的科技著作、五凉的儒家经典及其注疏、南北朝的佛经翻译等。

1. 科技文化用书：魏晋时期，甘肃著作和图书的种类和数量较以前都有所增加，除个人文集急剧增加外，科技文化方面又有大批新作问世。天文、历算和地学类著作至今有记载者就有 30 多部。安定朝那（今灵台）皇甫谧著有《年历》6 卷、《朔方长历》2 卷、《地书》《月令七十二候》《三五历说》；敦煌索袭著有《天文地理》十余篇；北地泥阳（今宁县）傅畅著有《晋历》2 卷；天水姜岌著有《三纪甲子元历》《三纪历》《浑天论》《浑天论答难》《论频月合朔法》5 卷、《杂历》7 卷、《历法集》10 卷、《历术》10 卷、《京氏要集历术》4 卷、《乾度正历》4 卷、《历序》等；敦煌赵馥著有《元始历》《河西甲寅元历》《甲寅元历序》《河西壬元历》《皇帝王历三合纪》《七曜历数算经》《周髀》《算经》《阴阳历术》和《乾度历》；敦煌索靖著有《五行三统正验论》；安定乌氏（今平凉北）张骏著有《山海经图赞》和《山海经飞鱼赞》；金城释宝志著有《十二辰歌》等。

《甲寅元历》又称《玄始历》，由善天文历算的北凉太史赵馥于沮渠蒙逊玄始三年（公元 414）所造。该历推算精确，在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改革闰法。北凉使臣南下时，以《甲寅元历》奉赠南朝。它不仅对南朝祖冲之的编制《大明历》很有帮助，而且被北魏文成帝于兴安元年（公元 452）所采用，取代了沿用已久的《景初历》。

这一时期的医学著作共有 10 部。主要有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10 卷、《皇帝三部针经》13 卷、《依诸方》《论寒食散方》、《集内经仓公论》等；陇西封衡著有《容成养气术》12 卷和《灵宝卫

生经》；敦煌张湛著有《养生要集》10卷、《养性传》2卷等。

皇甫谧是魏晋时期一位博学多才的医学家、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中年身患“风痹症”，精心从事医学研究，总结古代针灸疗法的经验，纂辑古代医书中的重要资料，并增加新内容，于公元256年写出了我国第一部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叙述了古代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及预防等方面的知识，阐述了经络理论，明确了穴位的名称和位置，提出了针灸取穴的原则和方法，是我国医学史上继中医经典《内经》之后针灸医学的又一次总结。它开创了中国针灸临床医学的先河，并为针灸学专科化奠定了基础。《针灸甲乙经》问世后，即成为针灸学和医疗实践的指南，被历代医学家奉为经典。在其后的南北朝和隋唐时代，《针灸甲乙经》就传到日本、朝鲜，被视为瑰宝。清代存轩刊本《针灸甲乙经》被“中国通史展览馆”列为我国古代医学的重大成果展出。直到目前仍受到我国中医学界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视和研究。

2. 儒学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甘肃地区的相对安定和地方政权对图书文化事业的重视，大有儒学西移之势。不少学者西行河西等地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当地也有一代学者崭露头角。魏初徵士敦煌周生烈注经传，颇传于世，其著作《春秋左氏传注》《要论》《论语义例》《论语注》《周生子》和《周生烈子》等，当时被列为教材广泛使用，扬名当代，流芳后世。

五凉分割河西后，不论是汉族政权的前凉和西凉，还是少数民族政权的后凉、南凉和北凉，都是提倡儒术，兴办官学，发展教育，从而促进了儒学著作的迅速发展，安定乌氏（今平凉北）张轨，出身经学世家，本人又以儒学显达。晋惠帝永宁元年（公元301）出任凉州刺史后，大力提倡儒学，振兴教育，征九郡胄子九百人入学，并设地位仅次于刺史的学官“崇文祭酒”掌管文教。他本人也写下了《易义》10卷和《周易张氏义》等著作。张轨死后，

子孙继位者仍奉此不逾，前凉境内，崇文尚儒蔚然成风。前凉主张骏命右长史任领处国子祭酒；张重华征祁嘉为儒林祭酒，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前往受业者达 2000 余人；西凉开国君主李暠是一个“通涉经史”、“雅好文典”的儒生。他在西凉立泮官，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征学者刘昚为儒林祭酒，掌管教育事务。北凉主沮渠蒙逊尊刘昚为国师，命其下皆北面受业。刘昚是当时的儒学名家，他在酒泉讲学时，养徒数百，一面讲学，一面著述，收集整理了大批儒家经典，撰写了一批史志传记。《周易注》为其儒学代表之作。

由于五凉政权崇儒重教和优礼士人，甘肃地区在五凉及其以后，出现了宋纤、郭荷、郭瑀、祁嘉、索袭、郭磨、索敞、宋由、张湛、宗钦、段永根、赵柔、程骏、常爽等一批有名的儒林著述人。其著作惠及当时，影响后世，在甘肃的图书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他们注释和整理的儒家经典及儒学著述至今有记载的有敦煌宋纤的《论语注》，天水尹毅的《论语注》《礼记音》，天水杨泓的《孝经注》，天水梁凯的《论语注》10 卷，敦煌郭瑀的《春秋墨说》和《孝经错纬》，安定朝那皇甫谧的《周易解》《礼乐圣真论》，北地泥阳傅玄的《五礼仪》，安定乌氏张轨的《易义》10 卷和《周易张氏义》，凉州常爽的《六经略注》，敦煌张通的《五经异同评》，敦煌刘昚的《周易注》，凉州常景的《儒林传》，狄道（今临洮）辛子馥的《三传经说异同比较》，敦煌阚骃的《王郎易传注》，武威阴宏道的《周易新传疏》10 卷等。

3. 史志传记：魏晋南北朝时的一批儒林著述人，博通经史，不仅编注和整理了一大批儒家经典，而且还撰写了大量的史志传记，今有记载者共 27 部之多。其中有敦煌索绥的《梁国春秋》50 卷和《符命传》，敦煌阴澹的《魏纪》20 卷，张谠的《凉州记》8 卷，段龟龙的《凉书》10 卷，刘庆的《凉记》20 卷，敦煌索暉的

《凉书》，敦煌张谿的《凉州记》12卷，敦煌索纬的《陇西人物志》，武威阴宏道的《春秋左氏传序》，金城（今兰州）宗钦的《北凉沮渠蒙逊记》10卷，天水赵逸的《夏国史》，敦煌阚骃的《十三州志》14卷，安定邓渊的《图记》10卷，敦煌张湛的《列子注》5卷，武威段承根的《国史》，武威阴仲达的《国史》，北地泥阳（今宁县）梁祚的《国纪》20卷和《魏统书》30卷，敦煌刘昞的《三史略记》84卷、《凉书》10卷、《敦煌实录》20卷、《人物志注》3卷、《黄石公三略注》，狄道（今临洮）李琰之的《国史》，狄道李仲尚的《前汉功臣序赞》，敦煌宋绘的《晋中兴书注》《中朝多士传》10卷、《姓系谱录》50篇、《年谱录》《晋书注》，南安（今陇西）姚和都的《后秦记》等。其中以《十三州志》为最有史料价值。而索纬的《陇西人物志》和刘昞的《人物志注》都是甘肃较早的人物专志，同以前单篇的个人传记相比，从质和量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

《十三州记》是敦煌人阚骃于公元300年到350年间写成的一部描述性的全国地理总志。记述了秦汉统一全国后各州郡县的区划变迁，山川、水道、江陵的地理位置及其地貌特征，也记述了各地的风土人情、特产、建筑等人文和经济概况。是甘肃的第一部大型的地理著作，在全国地理经典著作中也处领先地位。北魏地理学家酈道元在著《水经注》时，曾引述过《十三州志》的许多资料，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称它是中国最早的地理总志。

4. 佛教经书：我国的图书翻译事业，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开始的。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两汉三国时期，敦煌是我国最先接触佛教的地区之一。西晋初，敦煌地区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译经师。竺法护（公元231—308）其先月支人，世居敦煌。他八岁出家，博览六经，后随师游历西域诸国，精通异邦语言。西晋初，他由西域返回，携带大量佛教经籍，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他